

第三编 全民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

第九章 贯彻执行隐蔽埋伏方针

第一节 传达贯彻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政策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顽固派逐步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颁发许多反共文件，掀起反共高潮，破坏中共组织，解散抗日团体，压制抗日运动，加强反共宣传和专制黑暗统治，放纵特务横行，形势日益恶化。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在1940年5月4日给东南局的指示中确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人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统治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7种），孤立顽固势力，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秘密。东南局和各省委、各特委、各县委、各区委的工作人员（从书记至伙夫），应该一个一个地加以严格的和周密的审查，决不容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关之内。应十分注意保护干部，凡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了的干部，应转移地区隐蔽起来，或调至军队中工作……”同年12月25日发出的党内指示《论政策》也同样指出：“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中央指示发出后，广东省委和南路特委都认真研究，作出相应的决定。

上述方针政策，在1941年初传达到合浦中心县委，县委即开会研究，定出具体措施，切实贯彻执行。合浦县由于前一段普遍开展反逆流斗争，在散发“八路军通电”、发动大规模的反运米资敌的群众斗争、各学校开展反对反动分子的斗争以及在白石水进行武装自卫斗争中，很多党员和单位已经暴露，必须从各方面切实加以转变。根据合浦的实际情况和特委的指示，决定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工作：①派党员干部到灵山、钦县、防城等地积极发展组织，开辟地区，扩大范围，以转移一部分干部，壮大党的力量；②认真审查党员，清除不可靠的人，保证党组织的纯洁可靠；③加强党内思想教育、气节教育；④建立平衡

组织；⑤深入向山区农村发展，为建设山区农村根据地打好基础；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搞基层两面政权。当时，除白石水还进行武装自卫斗争，其他地方都迅速落实这些方针政策。灵山、钦县、防城及合浦新开辟的地区，一开始就执行这些方针政策，做到尽量隐蔽。

合浦是钦廉四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党组织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在这里建立起中心县委，它有责任也有能力派出干部帮助灵山、钦县、防城建立和发展组织。“合浦党案事件”以及前后斗争暴露了的干部、党员，也需要向较灰色的外县转移，这就促进灵山、钦县、防城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灵山县 早在1938年冬，中共合浦县工委就派在合浦一中读书的黄文法回灵山做开展工作，但没有很快扎根。1939年7月，又派在合浦一中（后在廉中借读）高中毕业的谭承裕回灵山，也没有在当地发展党员。1940年5月，合浦中心县委再派合浦一中高中毕业的党员罗英，带领北海的党员郭兆荣、黄幼茜、苏文熙、陈文山、梁国珍等去灵山工作，建立灵山特别支部，罗英任支部书记，黄文法任组织委员，谭承裕任宣传委员。当年8月发展了灵山的莫平凡为党员，1941年2月又发展邓业兢、邓传孔、钟佳（劳瑞佳）、何林4人入党，在灵山打下了基础。罗英到灵山不久，又陆续从合浦调暴露了的党员张家葆、王文邕、陈铭金、岑嘉毅、陈克刚（陈炳昆）到灵山工作，派何正四等一批党员到灵南工作。白石水武装斗争停止后，又调白石水区委书记卢文去灵山任特别支部书记，调朱菊清等去灵山教书，灵山党组织迅速壮大。

钦县 1939年3月，合浦中心县委派党员黄文楷到钦州师范教书，做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当年11月，日军在钦防登陆，继而占领南宁，钦州师范迁往粤北连县，黄文楷在那里发展了4名党员，他离开后，1940年秋党员发展到13个人，但不在钦县。1940年6月，合浦中心县委派北海的党员庞自，率领廉北的党员岑月英、罗永莹、王文邕、王资桐、黄裕起、伍朝汉、黄翠琼、利培凤、郭洛（郭庆堂）、刘胜英、俞永贞共12人到驻钦县那香国民党组织的南路第九游击队工作，建立特别支部，庞自任支部书记，岑月英、罗永莹分别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同年冬，日军退出钦州后，“南九”解散，这些人大部分撤离钦县，另行分配工作，只留庞自、岑月英、伍朝汉、黄裕起、郭洛在当地教书。1941年3月，国民党军一七五师以共产党分子嫌疑逮捕岑月英、黄裕起、郭洛三人，但抓不到证据，只好交保释放。因为他们已受注意，组织决定全部撤离。在此前后，南路特委先后调王次华（王启光）、周才业（黄木芬）、林国兴（林芳）、梁子材（梁永曦）到钦县工作，成立特支，林国兴任特支书记。1942年春，合浦中心县委从灵山调在合浦廉中入党的邓业懋到钦县小董，在农村工作，发展一批党员。1943年2月，中共合浦中心县委从廉州调邱鸿就、韩雪洲、罗伉烈、王瑶儒、苏少芳、黄文松6个党员到钦县那丽附近的保安乡土地田教书，开辟该地区，成立党支部，邱鸿就为书记，王瑶儒、苏少芳为委员。同年5月，中心县委通过关系从北海调何国达、蔡琳、陈祥军3名党员到钦县国民党县府中秘密工作。

8月，又从合浦调钟古（钟喜权）、陈均苑、陈铭琪3名党员考入钦州师范高师部，成立党小组，钟古任组长，他们在该校发展了7个党员。1944年3月，中共钦廉四属特派员杨甫从灵山调卢文任钦县特派员。

防城县 1939年6月“合浦党案事件”后，合浦中心县委委员会决定调已被国民党注意的、在合浦一中教书和读书的防城籍党员宁德棠、黄坚（黄翠英）、黄翠玉回东兴，重建东兴党支部（自钟竹筠牺牲后党的活动已中断十年），宁德棠任支部书记，黄坚任宣传委员，黄翠玉任组织委员，在学生和碗厂工人中开展工作。1941年3月，中共南路特委派李康寿（李健甫）到东兴工作，改由李任支部书记。5月，合浦中心县委从合浦派庞自、卢传义、罗英、许家骅、钟高鉴、王瑶儒、王琼儒、伍朝汉、黄玉金、陈铭璧、俞永贞、罗嫔烈、卢冠群、许维芳、钟逢仁、钟奇（钟高球）、苏振华等17名党员到防城，分配到全县各地工作，成立特别支部，李康寿任特支书记，庞自任组织委员，卢传义任宣传委员（当年底这些人大部分撤离）。1941年10月，中共南路特委派谢王岗为钦防巡视员，1943年8月，改任中共钦防特派员。

合北 为了加强农村工作，建设山区根据地，合浦中心县委在前段工作的基础上，先后抽调岑嘉毅、谭俊到合浦北部的龙门和寨圩工作，调王克、包恭、张放、张书坚到小江工作，调何醒予到小江、福旺、寨圩工作；调梁国珍、劳锦（劳家才）、温科、何国达、姚为政、蔡维中到寨圩区工作。

海南岛和高雷 1940年7月，在“合浦党案事件”中被捕出狱的陈任生、利培源、张九匡三人经审查作出结论后，和李英敏、罗文洪一起调往海南岛工作。同年2月，合浦县工委书记张进煊调往高州任高州工委书记。随后，庞达、王克、郭芳、邹贞业、李华良、伍雍娴、曾德才等也先后调往高雷地区。白石水武装斗争结束后，张世聪、朱兰清等也调往遂溪、廉江农村，以小学教师为职业，隐蔽工作。同意张文纲、陈冠庸、邓爱莲、伍雍谊、戚有莲等一批人去重庆等地升学。

县区领导干部的变动 经过干部转移调整后，合浦县区领导人员发生巨大的变化：1940年2月，中共南路特委常委温焯华根据特委决定，将合浦县工委改为中心县委，从遂溪调黄其江来任中心县委书记，组织部部长仍为谢王岗，1941年10月调离，由唐才猷任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朱明不久调离，改任何杏雨为宣传部部长。领导机关由白石水区迁去白沙宏德村的宏德小学。1942年8月，黄其江因病回特委，唐才猷、何杏雨也先后调离合浦，合浦中心县委工作由分管钦廉四属的南路特委宣传部部长杨甫负责。这一期间，合浦各区的党委负责人也有很大的变动：廉北区在庞达调走后，由叶信芳负责，1942年9月，由陈符隆负责。公馆区邹贞业调走后，1940年由徐永源负责，1941年由阮明负责，1942年以后由谭俊负责。西场区在米案后的负责人是黄模，1942年由叶信芳负责，1943年由包恭负责。小江区，小江米案后由宋家培负责，随后是王克、陈明景、张书坚。白石水区，

结束武装自卫斗争后，短时期内由陈普坤负责，后由陈明景负责。寨圩区，1941年春由岑嘉毅担任区委书记，6月岑嘉毅调往灵山后，由劳锦负责。经过这样全面的调整，党组织完全转入隐蔽状态，保存和发展了力量。

第二节 审查党员 改变领导方式

在国民党猖狂反共的形势下，必须使党组织纯洁可靠，防止混入内奸，防止突然事变，为此，必须严格审查党员。中央对此曾作过多次指示，省委和特委也作出相应的决定。1941年春，合浦中心县委即按中央和上级的指示，研究作出部署，把审查党员和干部作为重点工作，由县委书记黄其江亲自抓，向各县区作具体布置，要对所有干部和党员作严格的审查，在秋末全面完成任务。

审查干部和党员，主要是审查其政治面目，重点是具体查清其历史、社会关系、社会活动，看有没有问题或疑点，是否忠实可靠，工作要细致深入，不留死角。审查后要求对每个人都作出明确的结论，对发现的问题，分成几类处理：有奸细特务嫌疑的，立即隔离，对跟他有密切关系的人，要注意观察或采取隔离措施，保证不出问题；对曾任国民党军政职务的人和曾充当过绿林的人，看他在入党前是否交代清楚，是否在政治上断绝了关系，未交代清楚的，要彻底交代，保证断绝政治来往；对曾被国民党逮捕过的人，要他交代清楚被捕经过，狱中的表现，释放的情况，出狱后的表现，尽可能找有关知情人员查证清楚；对和可疑人员及历史不清的人有密切关系的，继续观察，不让过问党内机密；有些问题一时弄不清楚，但没有发现其他问题的，作为保留问题，让他继续过党组织生活和工作，但不让担任领导和做机密工作；动摇逃跑分子，清除出党；觉悟不高，消极不做党所布置的工作的，劝退或除名。每个县区对每个党员的结论，特别是发现的问题和处理办法，要报中心县委备案或批准，县委定期检查，具体指导，帮助解决困难。

县委对合浦党员审查的结果，对绝大多数党员都做出面目清楚、忠实可靠的结论，清除10多个消极动摇的党员（如原小江区委书记李秋、白石水区委宣传委员邱成绩等）；白石水区近10个党员因为不同意停止白石水武装自卫斗争，对县委有意见，停止了党籍（武装斗争后恢复）；对陈冠庸、邓爱莲等几个去升学的党员停止了关系（陈冠庸已恢复）；对一些有问题暂时弄不清的人，作了保留审查的结论（如黄池光等）。审查党员的任务完成后，黄其江亲自到南路特委作了报告。

审查党员工作的胜利完成，弄清党员的政治面目，取消一批消极不干工作的人的党籍，对有问题的人采取了防范的措施，纯洁和巩固了党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有效地应对当时严峻的形势，保证了党组织的安全。但当时由于无法外调，领导思想有过分要求的倾向，使一些本来没有问题的人蒙受冤屈，对一些人处理不当，影响了这些人的情绪和工作。

在审查党员的同时，加强对组织的整顿和秘密工作。严格规定党员非经组织批准，不

能自由行动，明确宣布并严格执行“自由行动脱离组织，不得恢复关系”。不准党员之间发生横的关系，即使过去有组织关系或很熟，现在没有正式的组织关系，也不能谈党内情况和党的工作。党员之间不能自由通信，非经批准也不能和家庭通信（因为很多党员调到别的地方，又改了姓名，国民党有严格的邮政检查，通信会暴露去向和情况）。有一段时间还禁止谈恋爱（容易暴露秘密），党员结婚要经组织审查批准或由组织介绍。约定秘密接头和交接组织关系，不按指定的时间地点到达，如果组织不清楚原因，就失去组织关系，领导机关所在地不准非指定的人员进入，不准存放党的文件和进步书刊等。提出“不应知的事不要知，不应问的事不要问”，强调执行秘密工作纪律，违反的就给予批评或处分，甚至取消党籍。

1942年初，中共南路特委指示合浦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唐才猷，在合浦建立党的平行组织，在原来党的组织系统外，另建立一个秘密的组织领导系统，同原来的规构分隔开来，不发生横的关系，以防原有组织遭到破坏时，还有这个平行组织领导工作，平行组织不发展党员，也不让原来党组织系统的人知道。

1942年5月，中共粤北省委和南方工委被国民党破坏；7月，广西省委被破坏。中共南路特委在1943年3月决定，撤销县区集体领导的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实行单线联系。钦廉四属由杨甫任特派员，领导合浦各区和灵山、钦县、防城。合浦各区的特派员为：廉北区是陈符隆，公馆区是谭俊，西场区是包恭，白石水区是陈明景，小江区是张书坚，寨圩区是劳锦。

第三节 加强对党员的教育

在国民党反共的严峻形势下，要巩固组织，开展工作，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加强党性、组织纪律性，培养艰苦奋斗精神和革命气节。

小江米案结束后，合浦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朱明，在小江垌心村举办过两期党员学习班，每期10人左右，每期六七天。学习内容是形势和党的方针、共产党员的修养、秘密工作方法和秘密工作纪律等，提高党员的思想认识，加强革命坚定性，学会斗争方法。1942年9月，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决定在灵山举办两期党员骨干学习班。9月下旬，在丰塘修竹蒙英翰家举办第一期，参加学习的有黄文法、邓业懋、莫平凡、岑嘉毅、蒙英翰、蒙英京（兼保卫和联络）等10多个人，主持人是合浦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何杏雨。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著作，时间原定半个月，但刚开办7天就被当地顽固分子发觉，即转移到合浦寨圩峨眉村继续学习。第二期在丰塘大隆村举办，时间是在10月间，学习25天。参加学习的党员是钦廉四属各县区部分党组织的主要骨干，计有谭俊、庞自、罗英、利培凤等10多人。中心县委派阮明去作主讲，学习内容主要是中国革命问题，党的性质、任务、纪律，抗日形势与任务等，阮明讲后，集

体讨论。学习结束，要求大家转入农村隐蔽工作，积极发展农村党员，组织游击小组，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

中共中央开展整风运动后，《新华日报》登出许多整风的文章，党内积极开展学习，为了领导好这一学习，1942年7月，中共南路特委宣传部部长、钦廉四属领导人杨甫，在白沙宏德小学举办党员骨干整风学习班，各区的领导人谭俊、卢传义、包恭、叶信芳等参加。学习党中央整风文件，杨甫作讲解，集体讨论，联系本身实际，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研究改造思想和改进工作，历时20天。学习班结束后，各区委和支部普遍开展整风学习。1942年上半年和暑假期间，何杏雨在南康雷田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每期20多天，学习《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整风文件。除了中心县委举办学习班，有些区也举办党员学习班培训党员。经常的学习形式是县、区领导到各支部、小组传达指示、布置和检查工作时，集中党员对他们讲解问题。讲解的内容很多，主要是中国革命、党的建设、阶级压迫和剥削、秘密工作、革命气节、形势和政策、斗争方法和工作方法、当地的实际、当地党员的思想 and 实际等，隔十天半个月或1个月进行一次。

平时，布置有阅读能力的党员自学或集体学习，学习的书刊主要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评〈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的著作）、《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社会进化史》、《大众哲学》等。对文化水平低的农民党员根据教育内容，编写通俗简明的材料给他们看。

在国民党反共十分猖狂的形势下，很难买到党内书刊和进步书刊。为了给党员提供学习材料，有一段时间，合浦中心县委负责党内教育工作的阮明，常在小江云坊小学编写印刷党内学习资料，翻印重要的文章和小册子，如《新民主主义论》《评〈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命运〉批判》等。当时，能够获得中央指示和讯息的办法是订阅重庆出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但是，国民党的邮检很严，一旦发现便加以没收，并追查订阅人，以“共党嫌疑”进行逮捕。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派人和同情革命的邮局人员研究，发现边界地方国民党没有派邮检人员，于是确定收件地点为：由重庆寄兴业县转寨圩邮局代办所（这样兴业不检查，合浦也不能远派人到寨圩检查），由该代办所的一位同情者把报纸另放一处，合浦中心县委派宁章毅以从小江到寨圩挑咸鱼出卖为名，到寨圩领取报纸送到中心县委的交通总站，再通过秘密交通分送各区。合浦中心县委订了50份《新华日报》供各区作学习材料，宁章毅从1940年初到1944年9月（发生“永信烟庄事件”时）往返运送报纸，没有出过问题。各区得到报纸后，便选择其中的重要文章和消息，翻印给当地党员学习。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合浦中心县委又积极在党内开展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国际统一战线的教育，并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说明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揭露其暴行，指出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和反法西斯战争必然胜利的前

途。

第四节 深入农村 锻炼队伍

经过四年多执行“隐蔽埋伏”方针，党的工作和党员队伍有了很大的变化，保存和积蓄了力量，在农村打下稳固的基础，党员思想作风有了很大的变化，党组织更加坚强。

执行“隐蔽埋伏”方针后，在廉州、北海等城市和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由于干部党员的转移，党组织在这些地方的力量大大减弱了，各主要学校中党员的数量亦减少了，各种斗争沉寂了，而另一方面，党在合浦周边的灵山、钦县、防城和在农村的力量则大大发展和加强了，总体上说，党在钦廉四属的力量是更强了。

从1941年到1944年秋，由于合浦中心县委抽调一大批党员和干部到灵山、钦县、防城等县工作，使当地的党组织很快发展和巩固起来，灵山党员由20人发展到70多人（包括外地调去的）；钦县党员由10多人发展到50多人（本地的30人）（包括原钦州师范支部坚持革命的党员）；防城党员由数人发展到60多人（包括外地调去的）；合北的小江、寨圩也新发展一批党员。总计合浦除了调出的，还有党员300多人。

在合浦县内，党员绝大部分转向农村，特别是山区农村，他们在农村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绝大部分在各农村小学，以教书为职业，在农村中办夜校或个别深入走访，向农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阶级教育、文化教育，帮助群众发展生产；用“兄弟会”“同心会”“壮丁会”（对付国民党抓兵）“农会”“姐妹会”等形式，组织群众，为群众谋利益；发动群众抗拒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勒索欺凌，抵抗地主的加租、加押、夺佃、高利贷等；发动沿海的盐工对抗盐警的欺凌。通过这些组织和斗争，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提高群众觉悟和组织程度，将其中的先进分子教育吸收入党。在工作中，有些党员还和农民一起同吃、同劳动，如谭俊在龙门塘田埭工作时，就和当地制碗的工人一起挑碗泥，深得群众的爱戴，工作很有成效。

当时农村工作最艰险的是在白石水停止武装自卫斗争后的恢复工作。1941年冬，白石水区按照广东省委的意见，自行解散队伍，埋藏武器，撤退干部。取消武装自卫斗争后，国民党反动武装1000多人还在那里“驻剿”了一年多，天天围村抓人，强迫群众砍光山林，并村围村，组织乡保反动武装封山卡路，强迫参加过斗争的人“自新”，不“自新”的人，强迫家属去找回来或悬赏通缉勒索出钱，整个地区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全区捕了1000多人，其中40多人押送廉州监禁，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很多党员都外逃他乡，或到山上长时间躲藏。1941年10月，合浦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唐才猷，通知在小江负责工作的陈明景到白石水区负责工作。由白石水区交通员郑绍棠带到斗争中心区外围的珍珠塘村非党员徐美才家，以逃征兵为名，在那里住下。以卖菜种作为掩护职业，每天白日挑菜种担走村串户，在反动派眼皮底下穿行，晚上找党员联系接头。但是党员很难

找，有的逃到外县外地了；有的害怕了；有的约几次都不来；有的见一次面就不来了；有的在山上等三四夜才见面。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才找到瓦窑窝的叶梓才夫妇、叶玉棠、吴顶兴，金街的赖源金、赖华臣，三角塘的黄玉昌、郑云辉、黄池江、黄福华等20多个党员，其中，有些人因为坚持反对停止武装斗争，县委不同意恢复其组织关系。陈明景见到这些党员，说他是张世聪派回来慰问的，他们都很感动。陈明景和接上关系的党员经常分别在山上的炭窑中谈心开会，说明国民党不去抗日，集中兵力在这里“围剿”老百姓是不得人心的；国民党目前虽然强大、猖狂，但黑暗腐败，欺压群众，为人民所反对，最终必将失败；讲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道理，指出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农民，只有参加革命，推翻国民党和地主阶级的统治，才能翻身当家作主；商议如何争取上中层人士出面，保释被捕的党员群众等。经过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党员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并遵照陈明景的布置，积极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随后，用“兄弟会”“同心会”“姐妹会”等形式组织群众，把群众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捉丁、抽税，反对地主加租改佃和抢耕；后来，在这些群众组织中，挑选一些人参加特别游击小组，对反动的保队做瓦解工作，对反动的保甲长发动群众改选或对他们施加压力，使之成为支持革命的“两面政权”。1942年初，把联系上的党员建立党组织：八桂塘村建立党支部，支书是赖桂廷；三角塘村也建立党支部，支书黄玉昌。建立党小组的有：那杨村，组长郑绍棠；细籐竹村，组长陈国兴；瓦窑窝村，组长叶梓才；成立不了支部和小组的就个别联系。在枫木根和石塘村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讲解形势、党员标准、党员的任务、新形势下的工作方法等，还培养发展了五六个党员。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工作，白石水区终于逐渐恢复过来。

在隐蔽埋伏期间，各地的党员都注意团结当地的中间人士，做好统战工作，如在南康争取团结龙德珍、李传德、陈凤尧等；白石水区注意团结张景斋、张金声等；寨圩区团结覃炳章等。同时，积极打进国民党的政权机构中开展情报工作，打入乡、保中掩护在当地的党员开展工作，尽量设法掌握乡保的武装。

这几年转变中的一个重大的收获是：改造和锻炼了大量知识分子的党员，他们深入农村，切实和当地农民相结合，和农民一起生活和工作，认真了解农村和农民的情况，学会做农民工作的方法，改变了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作风，变得踏实、认真，平易近人，养成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作风和决心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通过这期间的转移调动和艰苦工作，锻炼了党性，提高了组织性和纪律性，培养出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提高了党的战斗力。

这一切，都为以后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武装队伍，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五节 “永信烟庄事件”

1942年至1943年，是全国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日伪军集中优势兵力，向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野蛮的“大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在其统治区加紧了针对共产党的活动。

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和秘密工作的需要，1943年3月，南路特委指示，撤销中共合浦县、区委机构，组织领导形式改为特派员制，单线联系。由杨甫担任钦廉地区党组织领导工作，原中心县委书记黄其江已于上年8月调回特委另行安排工作，四属党组织的领导和联络工作就落在杨甫的身上。杨甫自1940年冬到合浦以后（当时的身份是粤桂边区工委领导成员，1941年初改任南路特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大部分时间都以刘德才的化名和经商的身份居住在白沙宏德村和梅菪垌村，以此为掩护进行秘密革命活动。杨甫担负直接领导四属党组织的工作后，感到原中心县委联络中心宏德小学，虽有优越的环境条件和可靠的群众基础，但地处钦廉地区东南边境，偏于一隅，对地域辽阔的四属地区联络十分不便，加上他又是外来干部，没有一个较好的社会职业掩护，很难应付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为此，他想要在廉州开个店铺做生意，并曾先后同原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何杏雨、灵山特支书记阮明等人分别谈过自己的想法，征求他们的意见，何和阮等人都表示赞成，并认为廉州烟丝生意好做，还能帮助解决一些活动经费，因此决定以做烟丝生意作掩护，并把廉州城作为联络中心，加强对四属党组织的领导。

1943年下半年，杨甫即着手筹备开设烟庄的工作，首先是筹集资金，当时合浦党组织的经费非常困难，除了极其有限的党费，没有任何资金来源，杨甫与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商量，由党组织发动家庭较富裕以及有积蓄的党员捐献。为了党的事业，许多党员拿出自己长期积累起来的钱交给组织，一些女党员慷慨地献出金项链、金镯子、金戒指等，还有人千方百计向家里要钱交给组织，如西场的王克就变卖家产捐献了200块光洋，西场党组织收集的款项也最多。这样，到1944年上半年，就筹集了近20万元“国币”作资金。其次是选择人员，当时决定，烟庄工作人员必须是政治上没有暴露，而又懂点经商业务的党员，最后在北海挑选当时在公馆璋嘉小学教书回来的党员伍朝汉，在合浦挑选陈普坤，烟庄办起来后不久，杨甫又把当时北海党组织负责人张树宪调回帮助工作。

1943年7月下旬，杨甫往灵山检查工作并布置建立烟厂，解决合浦烟庄开业后烟丝来源问题。杨甫在灵城大街公益号邓毅（邓业炯）住处，找来阮明、邓业兢、黄文法等人商量，由灵山党组织负责在灵山县城筹办一个烟丝厂，并通过阮明、邓毅，挑选了有经营烟店生意经验的党员邓荣存为“永信烟庄”门市部工作人员，指派邓毅负责筹建烟厂，经过一番筹措，即以邓业炯名义向灵山税局申请了营业执照，在灵山城郊萍塘村南园正式开业，工作人员还有非党员群众关添、刘二、邓四等。

筹集资金和人员安排问题解决后，杨甫打算找个本地商人合股经营烟庄生意，以免被敌特怀疑，但他是外地人，在合浦人地两生，只认识经常在广州湾至廉州之间贩运杂货的陈荣坤，他是地下党员陈普坤的哥哥，杨甫过去与他有过接触，知道此人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但当时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赞成抗日，也没有发现他干过什么坏事。在找不到更合适的合股人的情况下，杨甫通过陈普坤的关系，邀请陈荣坤合股经营烟庄生意，陈荣坤用他的洋纱换钱两三千元作入股股金。

经过将近一年时间，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便于1944年7月，在廉州阜民北路10号租了一间两层楼的铺子作为烟铺，定名“永信烟庄”，以杨甫的化名刘德才的名义向合浦税局申请营业执照，随即开始正式营业。这样，作为杨甫的掩护职业的“永信烟庄”，就在廉州城出现了。

烟庄办起来后，杨甫挂名经理，伍朝汉当掌柜，具体负责烟庄经营业务，邓荣存负责烟丝烤制和包装，还有一个姓邓的工友负责杂务。陈普坤、陈荣坤兄弟每日都在烟铺出入，但不负责具体业务。灵山烟厂由刘益基（刘十五哥）作交通员，经常护送烟丝到廉州，再由烟庄加工成盒装烟丝出售，烟盒的封面设计和绘图是卢文秘密制作的。开业后在《粤南日报》1944年8月9日第三版刊登了广告。

开业以后，伍朝汉等人白天在楼下铺面工作，夜晚就在店里住宿，陈荣坤因为是烟铺的股东，又是陈普坤亲兄，也在烟店楼上住宿。为了保守秘密，杨甫规定：除烟庄人员，不准任何党员在烟庄住宿。他就通过党员岑月英的关系，在廉州城郊沙窝冯崇规（岑的舅父）家找到一个住处，烟庄开业前一直住在那里，烟庄开业后，他又通过伍朝汉（一婶母住在德国楼内）的关系，在德国楼院内靠近门口的一排房子中租了一间，作为秘密住宿的地方，晚上多数时间住在那里，有时也住在一中学生党员余富茵的宿舍“平园”。

“永信烟庄”的建立，为杨甫的领导工作和四属党组织之间的联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各地负责人和交通员陆续到廉州与杨甫联系，但不直接到烟庄。当时杨甫在廉州有两个秘密联络点：一个是余富茵的宿舍“平园”，一个是当时负责联系廉州街道党员的岑焕祥家。来联系的人员先到岑焕祥家或“平园”与岑、余接上关系，再由他们转告杨甫来接头。来与杨甫联系的有各地负责人或交通员，如陈明景、阮明等，这些外地来的人，多数在外另找地方住宿，有的住岑焕祥家对面的房子，有的住在“平园”，偶尔也有住在烟庄的。在这段时间里，杨甫利用“永信烟庄”老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工作。

烟庄开业一段时间，杨甫即动身往灵山、钦县和防城等地检查工作，直到8月底才返回廉州。

大约是8月30日上午，杨甫想到“平园”去找余富茵，了解一下有没有人来联系过。他从烟庄出来，走到中山路廉阳茶室附近时，突然听到有人叫一声：“杨秋田！”杨秋田是杨甫在海南岛和广州时用过的名字，在这异土他乡的廉州突然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大

感诧异。抬头看时，只见临街一间两层楼的阳台上，站着他的海南同乡陈干才，陈干才同他打招呼后，就走下楼来。

杨甫是1938年在广州认识陈干才的。1936年，杨甫在广州出狱后，找不到党的组织，于1937年到广州湾晨光小学当教师，一段时间以后，为了尽快和党取得联系，他又回到广州，因找不到地方住宿，只好找海南同乡邓楷，邓是杨初中时同学，1927年入党，后被捕入狱，在国民党监狱里和杨甫关在一起，出狱后，1936年在余汉谋第五路军当少尉参谋。陈干才在国民党广州市邮政局当邮电检查员，和邓楷一起住在中华北路一间楼房的二楼上，杨甫投宿到邓楷家后就这样认识陈干才。

陈干才从楼上下下来后，热情地拉杨甫到斜对面的廉阳茶室去饮茶。坐下来后，陈首先打听杨到合浦的时间和职业，杨说，自广州沦陷后就做生意度日，东奔西走，在广州湾认识了合浦商人，就到合浦一起做生意。陈又问杨做什么生意，杨即大方地说开了个烟庄。当杨转问陈干才到合浦干什么时，陈干才竟然公开对杨甫说：“我是蓝衣社（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的人。”杨听了心里一惊，但表面仍装出非常自然的样子，他以关心老乡的口吻说：“你为什么干这个，做特务是不得人心的。”陈说是混饭吃。杨甫又探听了邓楷的下落，饮完茶，陈干才付了茶钱，两人就分头走。

陈干才的出现，使杨甫感到严重威胁。当天晚上，他回烟庄召开党员会议，将遇到陈干才的经过和两人在廉阳茶室谈话的内容告诉烟庄的党员伍朝汉、邓荣存，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并研究采取一些对付的措施：一是转移各种文件和进步书籍，二是研究出现险情时走脱的方法等。大概是第二天或第三天，张树宪（张放）从北海来，杨甫将情况告诉他，并让他在晚上把一些文件和进步书籍拿到岑焕祥家，由岑负责处理。与此同时，杨甫又将遇到国民党特务、烟庄可能已经暴露的情况转告了和他单线联系的各地负责人，要他们提高警惕，以防意外。但是，由于杨甫认为已知道陈干才的特务身份，而自己是烟庄老板，有合法的公开身份作掩护，陈干才还不清楚自己的政治面目，可以与之周旋，从中探听对方情报。加上当时党的经费来之不易，杨甫舍不得丢掉烟庄的资产。因此，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停办烟庄，而采取了一方面与陈干才周旋，另一方面想找别的商人来接替经营的错误做法。

这时（1944年9月），全国抗战形势发生新的变化，日军为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开始向湘桂线进攻，钦廉地区再度沦为敌后的严重局面即将出现，形势的紧迫和来自国民党特务的威胁交织在一起，杨甫认为党的许多重要工作都要重新布置，因此，打算一边对付着陈干才，一边抓紧时间布置战时工作：①在宣传方面，揭露日军侵占湘桂线的阴谋目的，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②组织撤退、隐蔽城镇党员。各中学党员学生随学校搬迁，在师生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已经暴露的或难于隐蔽的党员全部撤到农村去，以农村党组织为基础，积极收集枪支弹药，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等等。

在这段时间里，杨甫每天照常到“永信烟庄”柜台露面，其他人也依然照常营业。陈干才自遇到杨甫后，就缠住杨甫不放，白天经常到烟庄找杨甫聊天，他一个年轻助手杨善龙也经常到烟庄找杨甫和其他店员聊天，这样，杨甫就与国民党特务陈干才、杨善龙展开危险的周旋。

陈干才曾对杨甫说，在廉州的海南同乡很多，你在这里做生意，要多与老乡来往。有一天他找到杨甫，说海南同乡会要开会选举理事会，要杨参加，杨甫为了敷衍他，就与他一起参加一次海南同乡会会议。陈干才还带杨甫前去观看特务机关发给他的收发报机，杨甫曾对陈说过烟庄生意因税收太重不赚钱的话。因此，有一次陈干才就对杨说，合浦税务局长郑重民是海南同乡，他可以帮说情减轻烟税，陈带杨去找郑，但商谈不果。还有一次，陈干才对杨甫说：“日本人打过来了，我不准备跑，要化装隐蔽起来。”又问杨甫打算怎么办，杨甫说：“照样开我的烟铺。”陈又说经济有困难，要杨甫借给他3000元（国币）和一套便服，说过几天就还。杨甫推脱不了，不得已借3000元和一套半新的便服给陈干才。

9月中旬的一个傍晚，陈干才又到烟庄来请杨甫到廉阳茶馆饮茶，他先大谈他到过重庆和韶关办过华侨商品的事，然后又说国民党在合浦有各派系的特务组织，党政军方面有军统中统，各银行有CC派，税务局有蓝衣社，蓝衣社又分为联络组、交际组、行动组等，并说他就是行动组的组长。杨甫听了始终不露声色，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说：“我是生意人，对这些不感兴趣。”陈干才又说：“我听别人说你是八字脚（即共产党）的呢！”并要杨暂时离开廉州，杨甫说：“人家爱说什么就让他们去说吧，我做我的生意怕什么，我不离开廉州。”陈接着说：“不离开也行，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会告诉你的。”陈干才花言巧语，多方试探，杨甫只谈生意，不讲政治。

杨甫从廉阳茶室出来，预感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已步步逼近。他立即赶回烟庄，召集烟庄党员开会，将陈干才在廉阳茶室对他讲的话告诉了大家。当时张树宪、陈普坤两人在合浦医院留医，暂不回烟庄。杨甫把与他单线联系负责联系廉州街道党员的岑焕祥调到勾刀水去当教师。

有一天，杨甫抽空去合浦医院探望张树宪和陈普坤，杨在医院里又碰上了陈干才。陈干才说：因家里生活困难，让他老婆在医院里当护士，并介绍杨甫与他老婆认识。杨甫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张树宪和陈普坤，并嘱他们小心提防。

9月19日傍晚，陈干才又去到烟庄，他站在烟铺的屋檐下很认真地低声对杨甫说：“最近我听见有人说你是共产党头子，还有一部电台呢！”杨甫心里一惊，但马上装出十分生气的样子说：“真是胡说八道，我是做生意的人，要电台干什么！”陈干才接着说：“不是就算了，我是听别人说的。”说完就走了。从这些迹象表明，杨甫的身份早已暴露，处境十分危险，但是，杨甫除了将这些情况告诉烟庄的党员，还是没有采取果断措施立即撤退，而是错误地决定过几天才撤离烟庄。

1944年9月22日凌晨4时，国民党广东省第八区专员张国元，调集八区专署保安团、“淮海”自卫队共1000多兵力，突然全城戒严，包围“永信烟庄”，事件发生了。

事件经过是这样的：9月21日黄昏时分，陈干才的助手杨善龙到烟庄找杨甫，杨甫不在，他就坐在柜台对面与伍朝汉谈天，看样子是想等杨甫回来，等了一会不见杨甫回来，他便走了。这件事并未引起烟庄人员的注意，入夜以后，大家关了店门就睡觉了。22日凌晨，突然，一阵阵急促的拍门声把大家惊醒，伍朝汉、邓荣存急忙起床，先叫睡在楼下的那位工人不要开门，然后两人即从烟庄后门走出，那位工人跟着出来后，翻过右邻一间中药店的后墙，进去躲起来。烟庄后门出去就是江边，伍、邓二人过不了江，就沿着河边向东北走，被戒严的保安队截住，就这样被捕了。敌人把他们押回烟庄捆绑起来，搜查了烟庄。天亮后，敌人又把他们押到保安团部。与此同时，敌人在医院逮捕了陈普坤，住在医院另一层楼的张树宪，由于得到陈耀琪的及时通知，跟着身穿国民党军官制服、佩带手枪的陈耀琪离开医院，逃脱了敌人的搜捕。

敌人在“永信烟庄”没有抓到杨甫，即在全城封锁交通，逐户搜查，杨甫这时正好在“平园”余富茵处。原来，这一天杨甫离开烟庄，同往常一样，绕过几条僻静的小街，来到小巷深处的“平园”。“平园”是一个小小的园子，园子里有一座平房，园内环境幽静，这里原是廉中教师谭宏全的住宅，地下党员、廉中学生余富茵和几个同学暂时租作宿舍。因此，这里就成了中共合浦地方组织一个重要联络点，也是杨甫晚上居住的地方之一。那晚杨甫来到这里，和余富茵商谈布置工作之后，已是深夜，就上床睡觉了。睡下不久，听到一阵阵拍门声和“快开门，查户口”的吆喝声从附近街上传来。“平园”同样有人打门，杨甫和余富茵急忙起来，两人感到情况变化突然，便急中生智，让杨甫到后院的杂草堆里隐蔽起来，余富茵赶快叫屋主王大叔（谭宏全的岳父）起来开门，王大叔把门打个半开，只见保长带着几个警察打着手电筒来到门口，王大叔放开大嗓门说：“这里只有我女婿谭宏全在廉中教的几个学生住，没有外人。”然后又用慢声调说：“不信可人来检查。”这位王大叔平时靠卖炒花生度日，是个大酒鬼，可能带路的保长相信这个酒鬼老头不会说假话，只说声“走”，就带着那几个警察转到随达书院那条小街去了。

等王大叔关上门，余富茵急忙到后院，将情况转告了杨甫，两人立即将日积月累保存下来的大批党的文件和《新华日报》《救亡日报》《解放》《群众》等报刊用水浸湿搓成纸浆，倒进泥坑里掩埋起来，等到处理完这些文件、报刊，已将近天亮时分。

天亮时，杨甫想出去探听一下动静，便独自沿着“平园”外那条小街往中山路方向走去，刚到街口，便看到大街上还有三三两两的军警在来回巡逻，他赶快退回“平园”。余富茵把园门关上，不让杨甫再出去，并同杨甫约好，由他出去了解情况，不超过一小时就回来。余富茵别上布质校章，带上书本，骑着单车出去了。国民党军警对学生和公务人员都不盘问，因此畅通无阻，他来到烟庄附近，只见店门紧闭，大门上七歪八斜地贴满了盖

着血红大印的封条，街上行人皆止步观看，议论纷纷，在烟庄对面的店铺门口，还有两个穿便服携带着手枪的家伙，在鬼鬼祟祟地转来转去。余富茵急忙赶回“平园”，将烟庄被封等情况告诉杨甫，但烟庄里的人是谁被捕了还不清楚。杨嘱余再出去探听。余富茵去到平田一中（现合浦县第一中学），遇到来找王献芝的张树宪，知道国民党军警昨晚在医院逮捕了陈普坤，两人简单交换情况后，张树宪便坐余雇请的单车离开廉州。余打算回“平园”，凑巧在平田公路上遇到派人国民党“淮海”司令部任少尉电务员的中共党员陈耀琪，余带着陈直奔“平园”见杨甫，三人交流了情况，到这时，大家才比较清楚地了解到昨晚发生的“永信烟庄”被搜查，党员伍朝汉、邓荣存、陈普坤被捕的严重事件。

这时已是晌午时分，街上的戒严还未解除，杨甫认为必须立即离开廉州，就同余、陈两人商量走脱的办法。陈耀琪想了一会，说：“戒严部队上午12时以前收缩岗哨，这么多兵，都还没吃早饭，饿得呱呱叫，现在各部队各自为政，大南门只留一个哨兵，平园小街通往南康马路上戒严的都是淮海部队的兵，而且多是南康人，和我很熟，我可以掩护三叔（杨甫）出去。”三人经过一番谋划，决定杨甫化装成公职人员，由陈耀琪用单车搭其通过小南门、大南门“淮海”部队岗哨，送往南康。三人吃过午饭，杨甫迅速向余富茵布置了几件事：一是通知廉州党支部书记王献芝立即去灵山，将“永信烟庄”出事情况转告阮明，并写下了阮明的地址；二是了解被捕人员的情况报告组织；三是关照进步人士、一中教师符筑。然后即刻化装，杨甫换穿黑胶绸便服，戴上白通帽，扮成国民党地方官员；陈耀琪穿军官服装，扎着皮带，戴着蓝边一粒星的布质“少尉”胸章，佩带手枪，稍一整理，神气十足。化装完毕，先由余富茵到小南门城头侦察一番，情况没有变化，便立即出发，这时大约是下午2时，陈耀琪坐着余富茵借来的“三枪”牌单车，后架上坐着杨甫，往城南急驰而去。他们通过小南门出城基公路，又通过大南门，穿过定海桥，沿途站岗的国民党自卫队士兵看着他们的军官骑车带着一个“官员”通过，非但没有进行盘查，还持枪肃立向他们敬礼，在后面关照的余富茵目送他们出了城郊，才转回城里。杨甫就这样在陈耀琪、余富茵的掩护下，安全脱险。

伍朝汉等3人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国民党合浦保安团部和合浦监狱，敌人对他们进行了几次审讯，他们只承认是做生意的，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没有泄露党组织的秘密，也没有说过对党不利的话。国民党广东八区专署反动当局抓不到被捕人员的“罪证”，加上当时日军南侵，形势紧张，只好把他们投入合浦监狱囚禁起来。1944年12月，日军从南宁分兵向广州湾推进，合浦当局顽固派弃城而逃，看守廉州监狱的国民党军警也闻风撤走，伍朝汉等3人即和同狱难友打开牢门，越狱出来，到了附近农村。当天日军就通过廉州城向广州湾方向前进，后来伍朝汉去石头埠找到党组织负责人陈符隆，陈普坤去南康，邓荣存回灵山，也分别找到党的组织。

“永信烟庄事件”发生后，王献芝赶往灵山找阮明，转告“永信烟庄”出事的情况，

灵山及时撤退了烟厂。合浦、灵山、防城、钦县等地党组织在得到情况后，作了必要的隐蔽撤退，没有惊慌失措，在遇到这样大的突然事变时表现出平静和镇定。杨甫脱险到南康找到陈符隆时，凑巧南路特委交通员小陈来通知他立即回特委。于是，杨甫随小陈到白沙宏德小学，把爱人谭德和孩子撤往灵山南横山头村后，即返回广州湾特委机关。中共南路特委了解情况后即对杨甫进行停职审查，并决定暂停钦廉四属党组织的活动，对党组织和党员进行审查。各地党员在停止组织关系的情况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1945年2月全面举行武装起义后很长一段时间，四属党才逐步恢复组织关系。

“永信烟庄事件”的发生，是由于中共钦廉四属特派员杨甫只图工作方便，错误估计形势，把领导机关由隐藏的农村迁到四属政治中心的廉州，所用人员虽是没有暴露的，但实际上都是合浦、北海很“红”的、受国民党特务注意的伍朝汉、陈普坤、张树宪（杨甫就说过“陈普坤一经过，人们就闻到一股‘共产风’”），在遇到特务陈干才以后，又不及时果断处理。此案经审查后作出结论：是杨甫个人的错误，与组织和其他人员无关。但此事造成了很大的后遗症：钦廉四属党组织停止了组织关系，致使随后的武装起义没有全面、周密的计划和强有力的领导；为了审查党员，要所有的党员都参加起义，在武装斗争中接受考验，否则不恢复关系，成了拔根处置，影响各方面工作的发展；长时间停止发展组织，使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缺乏党员做骨干；长时间审查党员，挫伤了党员的积极性。